

魏源与天主教

靳环宇 刘军

在魏源的著作中,他对基督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等的概念区分得甚为明晰。如称基督新教为“波罗士特”(Protestant),称天主教为“加特力”(Catholic),称东正教为希腊教。由于魏源使用“天主教”一词最为频繁,且专著有《天主教考》,所以笔者在行文过程中,除引文之外,以使用“天主教”概念为主。

魏源之于天主教,虽在具体知识方面超过前人,而其认识和态度则完全与他们保持一致。亦即一味的否定和批判,在很多方面,都丧失了儒家优良传统,不自觉地与其士大夫角色产生了背离。魏源的思想在近代中国确实超前,他在天主教方面的许多思考和文字成为此后湖南乃至全国反教思想的滥觞,并由此酝酿出了湖南近代浓郁的保守思想氛围。也是基于对天主教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考察,魏源又得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结论,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改革求变并向西方学习的闸门。魏源这一对矛盾思想在中国整个近代都颇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并由之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本是为着拯救儒家文化,却反而与之背离。

(一)对天主教性质的思考

关于天主教的性质,魏源的认识前后多有歧异、舛误。或认其为“邪教”,“非我族类”;或认其为义理“偏僻”;或不以宗教视之,而以为“杂学”;或认为各教都有

自己适用的范围。总之,无论何种状况,都在拒斥否定之列。这些也都成为后人着力攻讦的对象。魏源虽然认为天方教“刚狠毒鸷,自为一类”,但是较之天主教义理方面却更为优越。他说:“天方教之事天,同于儒之事上帝,而袭取释教礼拜斋戒,持诵施舍,因果浅近之说以佐之,大旨亦无恶于世教。其以天地日月为上祭,山川水土为中祭,宗庙坟墓为下祭,不废神祇人鬼,亦胜天主教之偏僻。”还说:“吾读福音诸书,无一言及于明心之方、修道之事也,又非有治历明时、制器利用之功也,惟以疗病为神奇,称天父神学为劫制,尚不及天方教之条理,何以风行云布,横被西海,莫不尊亲?”

魏源还将天主教视为剽窃糅合各教之大杂烩,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只能称之为“杂学”。“西洋人之入中国自利玛窦始,西洋教法传中国亦自此。二十五条始大旨多剽窃释氏,而文词尤拙。盖西方之教惟有佛书,欧罗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犹未能甚离其本。厥后既入中国,习见儒书,则因缘假借以文其说,乃渐至蔓衍支离,不可究诘,自以为超出三教上矣。”“今考所言,兼剽三教之理,而又举三教全排之,变幻支离,真杂学也。”魏源又根据中外地理环境的迥异,而推断出天主教与儒教的性质相同,都是用来约束、规范社会人心风俗,只是各自适用的范围不同罢了。他说:“周孔语言文字,西不逾流沙,北不暨北海,南不尽南海,广谷大川,风气异宜,天不能不生一人以教治之。群愚服智群,讼服正直。文中子曰:

19 《金圣叹全集》(一),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89 页。

20 [德]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第 221 页。

21 《水浒传》,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84 页。

22 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34 页。

23 [英]霭理士:《性心理学》,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449 页。

25 转引自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35 页。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中文系)

西方之圣人也,中国则泥。庄子曰:八荒之外,圣人论而不议;九州以外,圣人议而不辨。或复谓东海、西海,圣各出而心理同,则又何说焉?”

(二)对天主教侵略性的揭露

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士在南洋、澳门、广东、香港出版的各类中西刊物,以及当时一些具有世界眼光的先进中国人的著述,是魏源得以了解当时西方教会情形(包括它们在中国的活动)的途径。他明确指出,英国的强大建立在对别国的侵略基础之上,而其侵略手段则不外传道、通商和武力征服三种。他说:英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济,遂雄”。后来,魏源更认识到西方列强传教中国所带来的危害:他们假借互市之名,专门以鸦片烟、耶稣教毒害中国人民和消耗其财富。魏源对天主教的这一认识贯穿了此后湖南以及整个中国社会。郭高燾受其影响颇为典型,亦认为“夷人之与中国交涉者,一日商、一日教、一日兵,三者相倚以行,而各异用。”到民国时期,一些学贯中西的著名知识分子仍认为在19世纪中叶,“基督教与以兵舰做靠山的商业行为结了伙,因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个宣扬爱人如己的宗教也就成为侵略者的工具了。”这时的胡绳也持有同样观点,说“西方各国的传教士便跟在大炮后面,同商品相伴随着而渐渐直入中国”。总之,西方宗教与其贸易、军事三位一体的侵略性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流传,实自魏源开始。

(三)反教方法之引进

魏源顺应人民情势,从各种书籍积极引进外域有效的反教方法,以为国人利用。不说这些反教方法首先出自魏源的宣传,但是因其宏篇巨制《海国图志》是鸦片战争后即应运而生,且其反教内容迎合了当时绝大多数国人的心理,所以这些反教方法为后来湖南及全国反教群众所普遍运用。这些反教方法就是“凿十字架于路口”和“埋耶稣石像于城闕以蹈践之”。这些记载都是魏源从《澳门纪略》一书中得来。

《澳门纪略》一书的作者也是一位传统的知识分子,对天主教教义及其传华持反对和批判态度。书中谈及中华属国安南和噶罗巴等地的反教经验:“昔西人有行教于安南者,举国惑之,王患之,逐其人,立二帜于郊下,令曰:‘从吾者立赤帜下,宥之,否则立白帜下,立杀之。’竟无一立赤帜下者。王怒,然炮杀之尽。至今不与西洋通市,至则举大炮击之,西人亦卒不敢往,倭亦然。噶罗巴马头石凿十字架于路口,武士露刀夹路立,商其国者必践十字路入,否则加刃,虽西人亦不敢违。又埋耶稣像于城闕以蹈践之。盖诸番严恶之如此,中土人士,乃信而奉之如恐弗及。”⁴¹

同治年间,湖南爆发的衡清教案、湘潭教案中,反教群众都运用了凿十字架、埋耶稣像于城闕、路口、信教群众家门口等反教方式,全国其它地区的类似现象也层出

不穷。

(四)反教思想之渊藪

站在儒家传统立场对天主教义理的辟斥和对该教侵略性的揭露和抨击都是近代中国社会反教思想的主要内容。在知识分子领域尤其如此。而代表反教最高峰的教案的发生,起主导作用的几乎都是下层士绅和民众。他们的反教思想因子没有前面所述的复杂高深,全是社会上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对天主教的诋毁、歪曲的言论。细考湖南及中国近代历次教案的发生,十居其九都是由于这种原因。而对天主教的诋毁、歪曲之集大成和信奉者,在近代中国的开端,当推魏源最为著名。因而他在这方面的言论,成为之后湖南乃至全国教案发生的思想渊藪。

魏源所作《海国图志》,多是汇录他人之书而成,转抄引用时一般无甚成见。但是他对于天主教则一反常态,所引之文几乎全都对天主教持排斥意见。《烈皇小识》言天主教违反天意,“遂绝此会”⁴²。《澳门纪略》言其“所云五经十诫,大都不离天堂地狱之说,而词特陋劣,较之佛书尤甚”,“必如圣朝用其历法而放斥其邪教,庶乎两得之矣”⁴³。赵翼《檐曝杂记》则只道其千里镜、风琴、乐钟(西洋钟)工艺之“巧绝”⁴⁴。俞正燮《癸巳类稿》则将其入其教之中国人称为“无心肝之人”。

清初西方耶稣会士来华之时,对其教辟斥最烈的人当数安徽歙县的杨光先。而魏源更是将其语言精义备载无遗。杨光先攻击天主教的言论主要在其《辟邪论》上下篇中,魏源则径引这两文内容数千字之多。所引杨文称:天主教不许供奉君亲牌位,不许祭祀祖先父母,真率天下无君父者也。中国入教之人,乃是自毁周、孔之教也。⁴⁵杨光先除看到天主教之入中国会破坏中国固有之人心风俗,危及传统的文化信仰而外,更预言西方宗教还有图谋中国之野心。他说:“而世尚或以其制器之精而喜之,或以其不婚不宦而重之。不知其仪器精者,兵械亦精,适足为我隐患也。不婚宦者,其志不小,乃在诱吾民而去之,如图日本、取吕宋之已事可鉴也。……今者海气未靖,讷察当严摭盗,开门后患宜愆。”⁴⁶杨光先拒斥天主教之教义虽不免偏颇武断之处,但他对于东西方历史地位、境遇的洞察,则不可谓不深。魏源对杨光先的《辟邪论》颇为看重,可能即在于此。在引用该文之后,魏源加以按语:“福音书耶稣自称为上帝之子,而称上帝为神父,未尝谓耶稣即上帝也。此论稍未中肯,其余大概得之。”⁴⁷

随之,魏源又亲自撰写《天主教考》上中下三篇,对耶稣会士利玛窦、庞迪我、艾儒略、毕方济、高一志、溥泛际等人所著宣扬其教义理之书逐一辟斥,并在文章最后胪列西方教会在中国所行之种种令人发指之丑行。而其真实性则非其所计。其内容为:

查西洋之天主教不可知,若中国之天主教,则方其

入教也,有吞受药丸,领银三次之事,有扫除祖先神主之事,其同教有男女共宿一堂之事,其病终有本师来取目睛之事,其银每次给百三十两为贸易贖本,亏折则复领,凡领三次则不复给,贖之终身。曩京师有医某者,岁终贫困,思惟入天主教可救贫,而邪教又不可入,乃先煎泄药升许,与妻子议言:俟我归,如昏迷者,急取药灌我。于是至天主堂,西洋人授以丸,如小酥饼,使吞之。予百余金,归至家则手掷神主,口中喃喃。妻子急,如前言灌药,良久暴下而醒,则厕中有物蠕动。洗而视之,则女形寸许,眉目如生。乃盖之药瓶中,黎明而教师至,手持利刀,索还原物。医言必告我此何物乃以相予。教师曰:此乃天主圣母也,入教稍久则手抱人心,终身信向不改教矣。乃予之而去。又凡入教,人病将死,必报其师。师至,则妻子皆跪室外,不许入。良久气绝乃许入,则教师以白布裹死人之首,不许解视,盖睛已去矣。有伪入教者,欲试其术,乃佯病数日不食,报其师至,果持小刀近前,将取睛,其人奋起夺击之,乃跟踉遁。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两(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洋人睛不济事。故西洋病终无取睛之事,独华人入教则有之也,亦鸦片不行之夷,而行于华之类也。¹⁸

可以说,中国近代社会中无论是上层官绅,还是下层百姓,在他们批驳天主教义理或因琐事而引发教案的思想资源里面,无不受到魏源反教言论的影响。而就魏源本人而论,这既是中国传统(明末清初)反教思想的延续,又是近代反教思想的开端。在中国反对西方天主(基督)教会的过程中,魏源的承上启下的地位非常明显。

二

作为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理论的开创者魏源,其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历史地位,以及其进步性与开放性都无人置疑。然而,从某一角度来看,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不是自己的独创,而是殷鉴历史的结果。他的睁眼看世界,也是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基础上,运用“知己知彼”的传统战略,以达“百战不殆”的目的。从本质上说,魏源对天主教的考察和论说,都是建立在现实家国的安危之上的。他之关注天主教,是将其作为假想和现实中的敌人的。因此其言论势必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其内容也有很强的煽动性、对策性、操作性等特点。

就中国鸦片战争前后及魏源在世的这段时间里,“夷”的很大的比重都是西方的教会及其传教士。中国人认识西方及了解西学也多是经由这些教会及其传教士之人。可以说,魏源对夷以及西学的了解和认识很大程度上也与教会有关。而对于天主教的探讨,魏源又主要侧重于它在中国传布的历史及其遭遇。

魏源首先从传教士那里获得了有关西学的基本知

识并对之作出了基本的评价。魏源很可能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将中西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的人。他认为西学与中国传统学问一样,也是自成系统,有体有本,有格有用。他评价艾儒略之《西学》:其文、理、医、法、教育、道科诸门,讲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则如中国之大学。医科、法科、教皆其事业。道科则在彼法中所谓尽性致命之极也,其致力也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¹⁹很明显,魏源是典型的中华文化优越论者。他认为西学在本质上只是器数之学,西学的整体不过异学罢了。因此得出结论,西学不可学,而只能节取其技艺。

其次,魏源从传教士那里了解到西方技艺之先进。从前所引文可知,赵翼赞叹由传教士带来的千里镜、风琴、乐钟等的功能、制作工艺之巧绝。反教最力者杨光先也称道传教士的制艺之精。职是之故,魏源也对西方技艺持首肯的态度,称“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在技艺层面,魏源确实承认西方超过了东方。由于曾身历鸦片战争的浙江战场,亲自感受到英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威力,更促使魏源深省中国所以致败的原因。因而对由传教士处而得的关于西方技艺优于中国的观念(最少是魏源思想的一个来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他之提出向西方学习其技艺的因应措施则有一定的必然性暗含在里边。

再次,魏源从明末清初朝野对待传教士的历史经验中得出了其因应现实的策略。正如杨光先所指陈,明朝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冯应京等人之结交耶稣会士,也是在其历法、仪器、算数等技艺层面。而至于中国之传统名教,他们“犹知不敢公然得罪”。清初政府也是取其折中之意,“用其历法而放斥其邪教”。杨光先对此也表赞同²⁰。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和考究,魏源已突破前人仅有的“思夷长技”的思想层面,在现实社会日趋严酷的生存压力中,更多地关注“思夷”和“制夷”思想的有效衔接。魏源了解到康熙初曾调荷兰夹板以剿击台湾,曾命西洋南怀仁制火炮以剿灭三藩,曾行取西洋人入钦天监以司历官等²²,从而得出“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起学术,具存深意”²³的结论。由是观之,“师夷长技以制夷”与这一结论的论域几乎完全一致,很难说魏源之“师夷制夷”思想的塑成不受其影响。

严格地讲,魏源对于西学和西教是有较为明确的区分的。他认为西学是杂学,但西学中包含有可资学习的技艺。魏源有时也称天主教义为杂学(见前所引文),但最主要的还是认其为异端邪说,既无“明心之方、修道之事”,也无“治历明时、制器利用之功”²⁴,因而应完全拒斥之。魏源虽然清楚传教士所持有的先进器物和技艺与其宗教无关,它们本质上属于西学的内容,但在中国当时

的历史条件下,东来的传教士无疑是西技乃至西学的主要体现者和输入者,与他们的交往在先进的士人中间自不可避免。曾国藩、郭嵩焘、李鸿章、左宗棠、曾纪泽等人无不有此经历。对于“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因应外力、拯救国家的思想本身,其“师”的广度、“夷”的范围当然宏阔,但就东来之教会和传教士而言,也是自成系统。这可能是对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更深一层的理解和表达吧。

三

魏源的上述思想,很难用激进或保守加以概定。内中既有对现实的理性超前分析,又有对前人未加批判的妄加采择。前者有助于开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先路,其思想可谓之先进;后者则酝酿和加固了近代国人浓郁的反教排外思想,有着明显的保守特点。魏源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先驱性地位,就在于他有着这种泾渭分明、相互拒斥的矛盾思想。这两种思想导演了中国近代各时期的思想主流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变化。魏源的这一对矛盾思想其主旨只有一个,即为了维护行将衰没的中华文化传统,救国家于危亡。历史证明,前者是一条有效方式,但最终却实现了效法西方的中国近代化;后者却上演了一幕幕失败的悲剧,这些悲剧本身就表明,他们已不自觉地背离了儒家的优良传统,盲目极端的铤而走险虽能舒心头一时之恨,最终仍然面对血淋淋的现实。一对矛盾思想、两条道路,最终都背离了中国的传统。这大概是魏源以及整个近代史中的中国人所不曾想到的结果。

注: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

魏源:《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785、802、838、835、838、840、1092、823、821、823、824、826、829、829、840、837、826、823、26、838、838页。

⑥杨竖点校:《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

面对外来宗教(天主教),魏源及其后来人抛却了传统儒家考据求真的笃实态度,妄信人言,且信誓旦旦。其罗列的教会各项乖张内容,都为后来湖湘以及全国绅民借题发挥。他在这方面的所有言词,都成为后来湖湘和全国人民反教思想的来源。

明明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自己根本也未曾见到,但仍是笃信不疑,这本身就表明了自己思想痛苦扭曲的真实境况。为了维护儒家传统文化,抵御异教的侵袭,只能如是为之。其代价,是抛弃自己在传统儒家文化中所陶铸生成的宽厚、忠诚、求真、慎独等等脾性,然而也毫无顾惜;现实家国的严峻局面,已容不得个人小我的洁身自好。由此而言,这种对传统的背离,其根本动力还是儒家传统文化所宣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炽烈的爱国思想。这一爱国思想,贯穿了近代中国反教运动的始终。

近代中国反教思想中对儒家传统精义的背离,经历了一个由产生、发展到高潮再至衰亡的过程。魏源肇其端,中经各地历次教案的积累升腾,到光绪中叶周汉系统反教思想的出现而达至巅峰(义和团运动严格意义上讲不能谓之教案,其实质是以全面排外为目的的反帝爱国运动),最后到戊戌维新时期,虽还有周汉的独幕戏,但已为社会大多数官绅所抨击,缺乏现实基础的呼应而走至末路。这一发展过程的特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传统的背离而愈加遥远。而对传统儒学的背离,则最终导致了它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其在中国人民中的崇高形象和地位也因之而坍塌和消逝。

版,第174页。

⑨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8页。

⑩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

(本文作者系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湖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